

何以实现动物正义?

——论玛莎·努斯鲍姆的动物伦理观

How to Realize Animal Justice? A Study on Martha Nussbaum's Animal Ethics

田琳 /TIAN Lin 信慧敏 /XIN Huimin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1106)

摘要: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将动物保护纳入了正义范畴, 提出了面向动物的能力论。不同于以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与康德式进路为基础的动物观, 努斯鲍姆的能力论从动物个体的角度出发, 认为所有有感受的动物都有权以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过上繁兴生活, 进而明确了动物正义的主体与目标。此外, 努斯鲍姆肯定了情感在动物保护中的能动作用, 试图通过唤起人类心中与伦理相协调的情感, 促使人们关注动物保护问题。她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洞见揭示了人类世背景下, 动物正义已不再局限于对动物痛苦的规避, 还需人类以正确的方式积极参与动物的生活, 主动承担起保护动物的集体责任。

关键词: 玛莎·努斯鲍姆 动物正义 能力论 动物伦理观 动物权利

Abstract: The prominent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er Martha Nussbaum integrates animal protection into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justice, proposing a capability approach tailored to non-human animals. Unlike anthropocentric, utilitarian or Kantian perspectives, Nussbaum's capability approach adopts the standpoint of individual animals, affirming that all sentient animals possess the right to lead a flourishing life in ways appropriate to their own nature, thereby clarifying both the subjects and objectives of animal justice. Moreover, Nussbaum emphasizes the crucial role of emotions in animal protection, seeking to engage moral emotions within humans to foster concern for animal welfare. Her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reveal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hropocene, animal justice entails more than merely avoiding suffering. It also requires human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animals' lives in appropriate ways and to assum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animal protection.

Key Words: Martha Nussbaum; Animal justice; Capability approach; Animal ethics; Animal rights

中图分类号: B82; N03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2.006 CSTR: 32281.14.jdn.2026.02.006

20世纪以来, 动物保护逐渐从对动物福祉的关注转变为对动物权利与正义的深层次探讨。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人类有不随意

虐待非人类动物并给予它们适当帮助的道德义务, 但拒绝将动物作为正义主体纳入正义体系。在他看来, “道德人格能力是有权获得平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美国太空小说的冷战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25WWB001);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费21世纪美国推想小说的疫病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ND202501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玛莎·努斯鲍姆《思想的剧变》中的情感智性研究”(项目编号: xcjxh20241201)。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9日

作者简介: 田琳(2001-)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Email: tianlin@nuaa.edu.cn

信慧敏(1982-)女, 湖南邵阳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推想小说、数字人文。Email: xinhumin@nuaa.edu.cn

等的正义的一个充分条件”, ([1], p.399) 而动物不具备道德能力, 因此无法成为正义主体。罗尔斯对正义的论述是否为动物正义 (animal justice) 留有空间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成为“‘动物正义何以可能’讨论的始点”。^[2] 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在《正义的前沿》(Frontier of Justice) 中谴责了罗尔斯将动物排除在正义范畴外的做法, 主张把动物纳入正义论的框架中。她指出, “动物有权发挥自己的各项能力, 这些能力对于过一种繁荣的、值得尊重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基于正义, 动物拥有各项权利”。([3], p.392) 与此同时, 努斯鲍姆主张将“能力论” (Capability Approach) 运用于动物保护, 以捍卫动物与人类同等的合法权益。该观点在努斯鲍姆 (M. C. Nussbaum) 《为动物的正义: 我们的集体责任》(Justice for Animals: Our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一书中得到了充分而详实的论述。书中努斯鲍姆进一步发挥了“能力论”在动物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将对人类正义的衡量法则拓展至所有有感受的动物。在她看来, “每个有感受的生物 (能够对世界有一个主观视角, 并且能感受痛苦和快乐) 都应该有机会以该生物的典型生活形式过繁荣生活”。([4], p.19) 所谓对动物的正义, 不仅限于传统动物伦理观中对动物痛苦的规避, 还应考虑动物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 确保每个动物都能在不受伤害或阻碍的情况下从事对自身发展有益的活动, 进而实现自我的繁荣发展。

一、批判与创新: 能力论视角下的动物正义

能力论是努斯鲍姆动物伦理观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为动物正义提供了新的衡量标准与实现路径。早在“超越同情与人性: 为非

人类动物的正义” (Beyond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Justice for Nonhuman Animals) 一文中, 努斯鲍姆就初步阐释了将能力论用于维护动物正义的构想。在她看来, “人类的行为方式剥夺了动物的尊严, 这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能力论是一种处理基本正义和权利问题以及制定基本政治原则的方法”。([5], p.300) 努斯鲍姆的能力论是对森 (Amartya Sen) 的能力进路 (capabilities approach) 的进一步发展。她指出, 森“从未说过能力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目标, 也没有说过它应该如何与其他政治价值观结合起来以追求社会正义。因此, 他的平等观点与正义理论之间的联系仍不清楚”。([6], pp.46-47) 在此基础上, 努斯鲍姆把能力论视为理解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框架, 将该理论用于性别平等、动物保护等多个领域。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康德式进路的动物观, 努斯鲍姆的能力论从动物自身的利益出发, 将每个动物都视为目的, 是对这三种动物观的批判性反思与修正。

努斯鲍姆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动物观称为“如此像我们”进路 (the “So Like Us” approach), 该理论旨在保护特定动物的合法权益, 理由是它们具有与人类相似的能力。该进路的代表人物怀斯 (Steven Wise) 将动物伦理引入法律范畴, 认为正义能够赋予特定动物法律人格 (legal personhood) 以及“身体完整和身体自由的权力”。([7], p.7) 怀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法律体系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但他对法律主体的界定极具争议。怀斯受自然阶梯观 (scala naturae)^① 的影响, ([4], p.50) 将人类置于生物群体的首位, 根据动物与人类的相似性, 将对动物的保护限制在了大型猿类、大象、鲸鱼等少数群体中。怀斯对“类人”指标的衡量仅从人类的角度出发,

①自然阶梯观 (scala naturae) 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他看来, 整个自然界以及所有生命形式都按照一种固定的、等级化的结构排列, 每个存在的实体都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 进而形成一种“从低到高”的层级链条。然而, 亚里士多德在后期的著作中修正了这一观点, 认为每个物种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争取繁荣生活, “没有任何生物是为了其他‘更高等’物种而存在”。到了中世纪, 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的概念在欧洲哲学和神学领域逐渐成形, 该巨链将自然阶梯观的层级排列扩展到宇宙的所有层次, 不仅包括自然界的物种, 还包括神灵、天使等非物质存在。

因此忽视了动物自身的特性。事实上,“评价能力的正确方式是看它们在一个生物的整体生活形式中的作用”,([4], p.69)其出发点应该是被评价的生物本身。相较之下,“如此像我们”进路将人类视为评判动物是否拥有法律权利的唯一标准,仅对少数符合标准的动物给予关注,却将更多的动物隔绝在了保护范围之外。这种做法不仅忽略了动物的独特价值,缺乏对物种多样性的认知与尊重,还会导致动物与动物间的不平等待遇,进而加深动物权利运动内部的分歧。

不同于“如此像我们”进路,功利主义动物观将动物保护的进一步扩大,它不再将人类视为衡量动物权利的模板,而是关注所有生物的痛苦与快乐,被努斯鲍姆称为“最小公分母观点”(least common denominator view)。这一动物观的代表人物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伦理和法律应该涵盖所有“能够感知快乐的生物”,这些生物有两类,“第一类是拥有人格的人类,第二类是其他动物,它们的利益被早期那些缺乏敏感性的法学家所忽视,因此被贬低至物品的范畴”。([8], p.225)边沁对古代法学家的批判打破了传统观念中人与动物的等级壁垒,主张人与动物在法律层面享有同等地位。在此基础上,边沁进一步指出“快乐和痛苦不会在任何质的维度上有差异,而只在几个量的维度上有差异”。([4], pp.76-77)虽然边沁关注了动物自身的感受,但他对快乐的量化具有明显的弊端。其加总式的算法将生命视为快乐的容器,只要快乐与痛苦中和的结果是正向的便可视作快乐。这也暗示了在追求集体利益的过程中,人类允许自己“有意识地牺牲某些动物的利益”。([9], p.28)这一视角既忽视了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与其所遭受的具体痛苦,也未能给予群体中处于困境边缘的生命应有的关注,因而缺乏对个体特殊性的考量。英国哲学家密尔(J. S. Mill)进一步完善了边沁的动物保护理论。他以人类为例,指出“禁止人类互相伤害(其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还包括对彼此自由的不正当干预)的道德规范对人类福祉来说,比任何指导人们如何管理某些领

域事务的准则(无论多么重要)都更加重要”。([10], p.107)密尔为正义和道德设置了底线,在这条底线的约束下,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每个个体免受不公正对待,而不是为了整体的幸福去忽视个人的痛苦。由此,他修正了边沁有关“快乐的容器”(containers of pleasures)的论述,将每个生物都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非整个生物群体中被量化的组成部分,进而赋予了痛苦质的差异。

相较于前两种理论,以科斯嘉德(C. M. Korsgaard)为代表的康德式进路对动物保护的阐释更充分地关注了生物个体的权益。科斯嘉德的动物观源自康德对道德与尊严的论述。康德认为人类必须始终把生物当作目的,而不应仅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可遗憾的是,康德延续了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思想,崇尚人的理性特质,否认动物具有和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因此康德在上述论断中所提到的生物仅限于人类。在他看来,人类对身边所发生的事物拥有清醒的认识(consciousness),因此“在等级和尊严层面完全不同于物品(比如非理性动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处置这些物品”。([11], p.15)尽管如此,康德反对随意虐待动物,但这一主张并非出自对动物权益的考量,而是为了防止人类因虐待动物而变得冷酷无情。科斯嘉德指出了康德观念的矛盾性,即康德希望人们“爱动物,但又不仅仅是以貌似爱它们的方式那样对待它们,而是真正为了动物本身而爱它们,不只是像欣赏审美对象那样去感受它们的美,而是要真正关心它的福祉和利益”。([12], p.102)这种“无功利的爱”与“通过爱来提升品格的功利性目的”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倘若人们真的爱动物,就必然会考虑动物的福祉,而非其中的利益。因此,科斯嘉德试图弥补康德动物保护论的缺陷,将康德为人类尊严与正义的辩护拓展至所有有感受的动物。在科斯嘉德看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所有动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追求适合自己的繁兴生活,另一方面也需承认每个生物个体都拥有不容侵犯的尊严,并尽力尊重它们对自身目的的追求。

尽管如此,努斯鲍姆指出科斯嘉德对动物价值的界定及其对人与动物的划分仍存在一定缺陷。首先,科斯嘉德认为,人类在赋予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把价值赋予了同一个类别里的一个物种的成员”,([4], p.110)如果“否认同一类别里的其他类似物种的成员具有同样的导向行动的价值(action-guiding value),这就是用心不良的”。([4], p.110)然而在努斯鲍姆看来,动物生命的价值应当源自动物本身,而非动物与人类的相似性。因此,科斯嘉德这种由此及彼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如此像我们”进路的困境中。其次,科斯嘉德将人类理性和动物性割裂的观点存在明显弊端。她认为,道德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动物不具有道德,因此它们是受制于生物本能的“消极公民”。可随着科学观察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同类乃至不同物种的情感,而人类自诩独有的道德行为也是通过后期学习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可见道德绝非横亘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鸿沟,即便二者存在区别,也只是量而非质的区别。

至此,努斯鲍姆并未对主流的动物伦理观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辩证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康德式进路下的动物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能力论。她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立场出发,主张动物有权追求适合自己的繁兴生活,并试图在亚里士多德、边沁和康德三者的思想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而达到最大化的正义。“人们实际上有能力做什么和成为什么样的人”([4], p.127)是努斯鲍姆能力论的出发点。在努斯鲍姆看来,“能力”并非指一项具体的技能,而是指“个体在被认为有价值的特定生活领域中,拥有一种真正的、实质的自由,或拥有选择行动的机会”。([4], p.134)投射到动物身上,就是指每一个生物都是积极、努力且独立的生命,它们拥有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繁兴生活的机会与权力,人类不应该也无权肆意操弄或评判动物的生活。此外,努斯鲍姆对边沁将个体视为快乐的容器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赞同密尔对边沁相关论述的修正。她反对以平均值来衡量群体的生活水平,

因为平均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底层生命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对平均值的关注容易使人忽视个体的多元性与异质性,进而掩盖群体内部巨大的不平衡。努斯鲍姆反复强调,每个个体都应该被视为目的而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受到尊重,且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时,这个群体才算实现了最低限度的正义。可以说,努斯鲍姆的能力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遍与特殊、集体与个体的中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一方面,她对动物群体的普遍思考能在不同动物间实现更大程度的共鸣;另一方面,对动物个体繁兴生活的关注也促使人们根据每个生物的个性化诉求做出新的、具体的调整。然而,努斯鲍姆对不同物种乃至同一物种内部每个个体权益的考量有些过于理想化,且具有一定难以实施性。因此,能力论为动物正义的实现搭建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其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从感知到实践: 情感体验为动物正义赋能

努斯鲍姆的能力论不仅为动物正义提供了理论框架,还将情感纳入了动物保护的体系中,以唤起人们对自身错误行为的感知。努斯鲍姆反对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对情感的长期忽视,主张将情感视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性》(*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中,努斯鲍姆就指出“情感是评价性判断的一种形式,它赋予了超出人们控制的人和事以重要意义”。([13], p.22)情感为道德判断提供了动力和参照,能够帮助人们切实理解他人的需求和处境,进而激发相应的道德行为。然而,辛格却强调“我们并不‘爱好’动物,我们只是要求人们把动物作为独立的有情生命来看待”,([14], p.2)以此避免动物保护者对动物的滥情。相比之下,努斯鲍姆对情感的论述则提醒人们重视情感在

动物保护中的能动作用。对情感的培养与体悟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认知,平等对待与我们共生的动物,并促使我们将肩负的责任付诸实践,而惊奇、同情与愤慨是我们由关注走向行动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种情感。

努斯鲍姆认为,当下动物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源自人类自身的贪婪和傲慢。所谓傲慢,是指自视为主导群体的人类相信自己高于一切,“在自我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15], p.47)这种自我优越感促使人类将自己视为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将动物视为服务人类的工具与资源,进而忽视了动物内在的权利与价值。但丁将傲慢的人比作铁环,他们弓着身子只能看见自己却看不见别人。在傲慢的驱使下,人类只专注于自己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特质,例如对语言和复杂工具的使用,并将其与动物进行比较,哀叹动物的无知无感,殊不知这些技能对动物自身的繁兴生活而言或许并不重要。相反,动物所具备的诸多能力,例如敏锐的感官、发达的运动神经等恰恰是人类望尘莫及的。此外,傲慢不可避免地导向了物种歧视(speciesism),认为人类具有比其他物种更高的道德地位,“可以为了任何琐细的理由,甚至在全然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对非人类动物为所欲为,而不会招致任何正当的谴责”。([14], p.10)对动物能力的轻视与对动物道德地位的否认最终导致了人们对动物繁兴生活的阻碍,对此,努斯鲍姆试图唤起“一种与伦理相协调的惊奇(wonder)”,([4], p.33)从而为人们关注并保护动物提供动力。惊奇在“使世界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 p.322)它“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重要的、有价值的”。([4], p.34)

努斯鲍姆将惊奇与伦理关注联系起来,认为惊奇是一种开放且带着敬畏的心理状态,它意味着我们被某个事物所触动,进而促使我们

产生“想探寻引发惊奇的原因的欲望”。([16], p.28)与此同时,惊奇能够将人们带出对自我幸福的关照,因而具有非幸福论的(non-eudaimonistic)表征^①。([13], p.31)([4], p.35)它使我们摆脱对自我繁兴的关注,转而带着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原初喜悦”([4], p.35)将目光转向其他物种的生活。此时我们不再视动物为运转的机器,而将它们看作一个个有感受的生命,好奇动物所做的一切对它们自身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并在它们的繁兴生活被阻碍时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即意识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惊奇在推动人们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壁垒后,还会引发一种以伦理为导向的同情(compassion)。努斯鲍姆将同情定义为“一种指向一种或多种其他生物所遭受的严重苦难的痛苦感情”。([17], p.142)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对其他生物痛苦的共情应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是重要性(seriousness),即产生同情的主体必须肯定这种痛苦的重要性,认为这严重影响了那个生物的繁兴生活;第二是无过错(non-fault),即人们必须认为他人的糟糕处境是由外界因素而非当事人自己导致的,他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痛苦;第三是相似的可能性(similar possibilities),即人们必须感到自己也有可能面临相似的困境。努斯鲍姆对第三个要素提出质疑。在她看来,“如果只有在看到自己与他人相似的可能性时才能产生同情心,那么这种感情将取决于我们感知这种相似性的能力”。([13], p.316)事实上,即便不存在与他人相似的痛苦,人们也能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同情。此外,阶级、种族、性别、尤其是物种的界限在情感上很难跨越。正因如此,斯宾诺莎等人才将情感上的差异视为对动物的痛苦漠不关心的理由。所以,遭受相似痛苦的可能性并非产生同情的必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努斯鲍姆提出了第四个要素也就是幸福主义思想

^①努斯鲍姆在2001年的著作《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性》中提出了幸福论的观点(eudaimonism),这一观点源自古希腊的幸福伦理学(Eudaimonistic Ethics),指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潜能,并过上充实且有意义的生活。努斯鲍姆指出,“情感具有幸福论的(eudaimonistic)特质,也就是说情感与个人自身的繁兴密切相关”。情感通常会将引发情感的对象与主体自身及其幸福观联系起来,但惊奇却与人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无关,而是与人们“对生活本身的原初喜悦有关”。

(eudaimonistic thought), 即人们必须相信那个生物所遭受的痛苦对我们实现自身的目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的影响。然而努斯鲍姆近来也意识到了这一观点的局限性, 惊奇将动物纳入人们的视野, 但并不一定产生自我指涉的作用。换言之, 我们关注某个生物, 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生物的福祉视为自我繁兴的一部分。因此她对第四个要素进行了修正, 指出“我们需要相信, 那个遭受痛苦的生命是重要的, 属于我们关注圈的一部分”。([4], p.40) 鉴于“人们很难将他人与自己联系起来, 除非通过思考他们关心的事情”, ([13], p.319) 因此一旦其他生物的痛苦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 一种持久的同情便会油然而生。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很多时候并未真正从动物的视角进行共情, 而是将动物想象成人类, 或是将人类的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 却恰恰忽略了这些情感未必是动物的真实反应。事实上, 动物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周围环境做出回应, 这些回应并非因为与人类相似才值得我们重视, 而是因为它们是动物自己的主观体验。换言之, 我们共情动物的痛苦, 不应是因为它们像我们一样表露了痛苦, 而是因为它们感受到了痛苦。正如努斯鲍姆所言, “真正的共情必须基于知识”, ([4], p.374) 人们只有切实地了解动物差异化的生活习性, 充分承认动物自身的能动性与其独立性, 才能站在平等的角度共情它们的经历。

然而, 人类对动物所遭受的痛苦仅仅感到同情是远远不够的。同情本身并没有对痛苦的根源——施暴者做出回应, 也不能阻止施暴者实施进一步伤害。因此, 努斯鲍姆提出了第三个情感愤慨(outrage), 也叫“过渡性愤怒”(Transition-Anger)。在她看来, 过渡性愤怒“面向的是未来, 它试图修复这个通往未来的世界”, ([15], p.84) 因此它是一种合理的愤怒。尽管过渡性愤怒也会要求对施暴者进行惩罚, 但与报复性愤怒以牙还牙式的施加痛苦有着本质的不同。报复性愤怒追求的是与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相称的痛苦, 并以此作为对施暴者的惩罚, 它“要狠狠地回击, 要给施暴者造成伤害……以此来报复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

的对待……它是惩罚性的”。([18], p.32) 相较之下, 过渡性愤怒旨在产生威慑与阻止的作用, 它促使我们注意到那些糟糕的现状并鼓励我们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也与努斯鲍姆提出动物保护论的初衷不谋而合: 她希望我们不止步于哀叹有罪的过去, 而是将情感付诸行动, 进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努斯鲍姆将能力论与情感相结合, 强调人类与动物间的情感联系, 使人们在践行动物保护时不再单纯依赖抽象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框架, 而是通过切身的情感体验理解动物的困境。此外, 情感不仅能够激发人们对动物保护问题的关注, 还能增强人们对动物权利的道德承诺, 进而赋予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更强的动力。在惊奇、同情与愤慨等情感的积极干预下, 人们能够及时采取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护动物的正义。

三、困境与突破: 能力论对动物保护的现实关照

在努斯鲍姆看来,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 还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物”, 都无法彻底摆脱人类的影响。对动物的正义已不仅仅是停止对动物造成伤害, 而是要主动承担起保护动物的集体责任。此外, 努斯鲍姆并未完全否定对动物的使用, 而是主张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减少直至消除对动物的不公正对待。努斯鲍姆对能力论在不同情境下的运用, 尤其是对人类与动物关系的解读颠覆了传统动物伦理观对动物痛苦的刻意规避, 转而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动物生活中, 打破了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壁垒。

努斯鲍姆认为人类对动物保护, 尤其是对非驯养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存在一种模糊甚至逃避的态度, 这种尴尬局面与浪漫主义时期人类对野外的向往与歌颂密切相关。那时的人们不满于工业革命下充斥着剥削、肮脏与颓废的世俗生活, 转而在大自然中寻求慰藉, 从而将自然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 最终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单向的精神索取。究其根本,

浪漫主义自然观对自然的崇尚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尽管它激发了诸多善的行为,呼吁人们去保护那些未受人类社会污染的土地与生命,但这种善是为了满足人类审美、疗愈人类身心而产生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然与动物本身。这样的自私心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对动物所处困境的忽视,甚至让人类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伤害它们,例如提倡被美化的娱乐性狩猎与带有施虐癖性质的野生动物展演等。这些活动看似是对自然生活的回归、对动物野性的再现,实则将动物当成了娱乐人类的手段,是对自然虚假的尊重与欣赏。

除此之外,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还存在另一个误区,即寄希望于大自然的自我调节功能,认为人类活动会破坏生态平衡,进而反对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生活实施干预,努斯鲍姆称此类观点为“自然平衡观”(balance of nature)。自然平衡观认为,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部各物种之间可以通过相互作用实现一种动态平衡,而“物种多样性就是维持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可入侵性和营养动态的决定性因素”。([19], p.471)这样一种自然平衡的神话“不仅告诉我们,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将保持不变,而且还告诉我们,这种不变的状态是最理想的”。([20], p.2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断预设了世界上仍存在完全不受人类影响的野外自然。可如今人类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倒性和全球性作用”([21], p.1)预示着“人类世”(Anthropocene)^①时代已经到来。([4], p.248)“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超过自然驱动力的影响”,([22], p.1288)即便人类不对自然进行干预,自然也无法达到对生物和环境而言理想的平衡状态,更何况世界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与人类活动毫不相关的自然。出于对人类世的考量,努斯鲍姆认为“对自然的尊重不应该也不可能意味着只是让自然保持原

样”。([3], p.369)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生态系统的大循环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周围的生物与环境,而科技的发展更是将这种影响在范围上和程度上不断扩大,直至“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完全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4], p.318)因此,自然平衡观实为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依旧固守着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视人类社会为被欲望扭曲的牢笼,视自然为祥和宁静的世外桃源,殊不知二者的命运早已密不可分。这样一种不加干预的做法既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回避,也是人类对既已犯下的过错进行补救的放弃。正如努斯鲍姆所言,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关于选择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自然的问题”。([4], p.350)逃避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后果的做法,它不仅不能促进动物的繁兴生活,还纵容了当下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动物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除了给予野生动物适当的保护之外,努斯鲍姆试图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重塑人类与动物间的关系。她的能力论将动物纳入了道德和法律的考量范畴,强调从动物而非人类的视角出发,尊重动物的内在价值与追求繁兴生活的权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视人类为万物尺度的做法。同样反对这一观点的还有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动物保护者。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不仅主张推翻人类的中心地位,还致力于彻底重塑人类与动物的身份。他们拒绝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视作一种单向的支配或利用关系,而是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在此基础上消解人类与非人类物种间的界限。后人类主义动物观的代表人物哈拉维(D. Haraway)提出了“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的概念,她指出“‘伴侣物种’是一个比伴侣动物更广泛的类别,这不仅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必然涉及水稻、蜜蜂、郁金香和肠道菌群等有机生物,所有这

^①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一个用于描述人类对地球生态、气候和地质产生深远影响的概念,它强调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中的主导力量,并且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努斯鲍姆对这一概念持辩证态度,一方面,她赞同人类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她指出人类世暗示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并对这种破坏表达出诸如叹息、憎恨等强烈的负面反应,这种消极态度并不能为人们弥补已经犯下的过错带来动力。

些生物都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反之亦然”。([23], p.15) 由此, 哈拉维强调了人与其他物种间的共生关系, 认为人和其他物种是在历史、文化和生物学上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产物, 因此所有生命形式都应被赋予同等的价值与道德考量。相较之下, 努斯鲍姆并未否认人类自身独特的价值与权利, 而是在谴责人类对动物福祉的忽视与不公正对待的基础上, 将人类所享有的正义与权利延申至非人类动物, 进而提高人类自身的道德与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 人与动物的利益冲突为动物正义带来了新的伦理困境。对于人类将有感受的生命当作工具使用这一问题, 努斯鲍姆认为自己“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自由派修正主义者, 但有革命性的一面”。([4], p.244) 首先, 努斯鲍姆明确指出即便对有感受的生物进行人道处死也是错误的, 并由此提出了“中断论证”(the interruption argument)。在她看来, “任何会中断随时间展开的活动的死亡”都是一件坏事, “因为它中断了一些在时间中展开的目标, 使它们全部或部分地变得空洞和徒劳”。([4], p.228) 对动物而言, 人类的宰杀中断了它们通向繁兴生活的发展, 否定了它们此前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所有努力,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尽管努斯鲍姆认识到了死亡对动物带来的伤害, 但她并不提倡采取极端的措施, 即立刻禁止一切对动物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行为。针对动物医学研究、动物食用、传统文化习俗保护等悲剧性困境(tragic dilemmas)^①, 努斯鲍姆主张借鉴哲学家黑格尔对悲剧的处理方式, 鼓励人们在悲剧性冲突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直至防止悲剧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 悲剧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想象力, 即设想出一个不会导致当事人陷入悲剧性困境的情境。努斯鲍姆将这种道德想象运用到人类和动物的利益冲突中, 认为当二者都有值得实现的目标且无论维护谁的权益都会对另一方造成

伤害时, 人类应当肯定并尊重双方目标的价值, 进而在不忽视或轻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础上, 构想出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动物使用有望被计算机模拟技术所代替, 但考虑到使用成本与大众接受度等问题, 对动物使用的全面禁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努斯鲍姆认为在这种构想真正实现之前, 我们要尽力缩短过渡期, 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动物使用给动物带来的不正当伤害。

结 论

努斯鲍姆认可了非人类动物的权利, 倡导将动物保护纳入正义范畴, 并提出了面向动物的能力论。这既是对早期能力论的发展与创新, 也是对其他动物伦理观的批判与修正。通过构建一种适用于动物的能力论, 努斯鲍姆将所有有感受的动物都视为独立的、拥有自身价值的且值得尊重的正义主体, 认为它们有权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过上繁兴生活。与此同时, 努斯鲍姆从动物个体的角度出发、视动物为目的的做法充分尊重了动物自身的差异性与主观能动性, 也为动物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标准与路径。然而, 努斯鲍姆对个体动物繁兴生活的考量有些过于理想化, 因此存在一定的难以实施性。正如她自己所言“能力论描绘了一个目的地。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到达那里……它就像为这个世界上动物们颁布的一部虚拟宪章”。([4], p.172) 因此, 在实现每个生命个体繁兴生活的美好愿景下, 我们作为动物权益的代理人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 动物权利与人类权利如何才能实现平衡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2] 赵芙苏. 动物正义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契约主义的

^①悲剧性困境(tragic dilemma)源于古希腊悲剧, 剧中的主人公往往面临两种或多种互相矛盾的选择, 每一个选择看似都有正当理由, 但都会带来某种无法避免的痛苦或损失。这种情境通常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从而让决策者陷入两难的境地。这种悲剧性困境在人与动物的利益冲突中时有发生, 以医学实验为例, 一方面我们亟需研制出新的治疗手段来拯救人和动物的生命, 但另一方面, 研制过程中涉及的医学实验难免会给实验动物带来伤害。由此, 动物保护陷入了新的困境。

- 探讨[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7): 50-56.
- [3] Nussbaum, M. C.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玛莎·努斯鲍姆. 为动物的正义: 我们的集体责任[M]. 王珀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4.
- [5] Nussbaum, M. C. 'Beyond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Justice for Nonhuman Animals'[A], Sunstein, C. S., Nussbaum, M. C. (Eds.)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99-320.
- [6] Nussbaum, M. C.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A], Kaufman, A. (Ed.) *Capabilities Equality*[C], London: Routledge, 2006, 44-70.
- [7] Wise, S. M. *Rattling the Cage: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Animal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 [8] Bentham,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0.
- [9] 赵芙苏. 动物正义: 动物权利研究的政治转向[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4(5): 27-33.
- [10] Mill, J. S. *Utilitarianism*[M]. 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 2009.
- [11] Kant, I.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M]. Loudon, R. B.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Korsgaard, C. M. *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Anima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3] Nussbaum, M. C.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 彼得·辛格. 动物解放[M]. 祖述宪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 [15] 玛莎·努斯鲍姆. 傲慢的堡垒: 性侵犯、问责与和解[M]. 陈玮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23.
- [16] Kao, W. 'The Body in Wonder: Affective Suspension and Medieval Queer Futurity'[A], Ahern, S. (Ed.) *Affect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 A Feel for the Text*[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25-43.
- [17] Nussbaum, M. C.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8] King, M. 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nviolence'[A], Washington, J. M. (Ed.)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C],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1, 31-34.
- [19] Tilman, D., Isbell, F., Cowles, J. M.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2014, 45(1): 471-493.
- [20] Botkin, D. B. 'Adjusting Law to Nature's Discordant Harmonies'[J]. *Duke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um*, 1996, 7(25): 25-38.
- [21] Syvitski, J. 'Extraordinary Huma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sultant Geological Impacts Beginning Around 1950 CE Initiated the Proposed Anthropocene Epoch'[J]. *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 2020, 1(1): 1-13.
- [22] 方修琦. 人类世的多角度透视[J]. 古地学报, 2024, 26(6): 1287-1034.
- [23] Haraway, D.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M].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